

江西中共党史讲习会讲稿

大革命时期江西人民
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文 耀 奎

(内部材料 请勿外传)

大革命时期江西人民反对

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文耀奎

(一)

江西的国民党组织，渊源于孙中山组建的同盟会。一九〇五年七月三十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建立同盟会。一九〇六年，孙中山派黄格鸥、魏会英回江西建立同盟会组织。黄格鸥（清江县人）到南昌后，成立了江西支部，并任支部长。一九〇四年在南昌成立的易知社的大部分加入了同盟会，其中，蔡复灵全家刺血加盟，他和弟弟蔡锐霖奔走于瑞州、袁州、临江、吉安各地，所至建立分部。魏会英是赣州人，他在赣州成立了同盟会组织。江西同盟会建立后，至辛亥革命前，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一九〇六年，清政府在江西建立新军，不少会员投入了军队；创办了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刊物《江西》；积极领导了一九〇六年发生的“南昌教案”的斗争；一九〇九年，在江西建立了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共进会，团结了一批赞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人士等，为响应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辛亥革命爆发时，江西同盟会热烈响应，为推翻反动的清王朝作出了重大贡献。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江西的革命党人，仍然追随孙中山，从事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一九二二年，孙中山发动讨伐北洋军阀的战争失败后，一些坚持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人纷纷离开江西，国民党在江西“党务亦趋于停顿”。①国民党处于绝望之中。

国民党在江西的新生，是由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的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所开创的。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共产党员赵醒侬等依据党中央的指示，积极地在团南昌地委讨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团地委向团中央的报告中记载“加入国民党问题依中央局通告照办，同志有少数怀疑的已为解释”。②一九二三年底，接到召开国民党一大的通知，立即推举了赵醒侬、刘拜侬、洪弘义（后二人~~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代表出席大会。附带说明：江西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共九人，其中肖炳章、彭素民、王恒是，孙中山指定的，徐苏中、周建丁、胡谦等三人是担心因邮电、交通问题各省区选举代表到不了会，又由在广州的国民党员推举三人，后来孙中山认定全部有效。一九二四年一月九日，赵醒侬赴粤途经上海时，写信给团中央说：“醒侬本拟在寒假期间抽空回家（南丰县）一走，籍可摒挡一切家务，不料南昌民校同志又推我为大会出席代表，我认民校前途进步于我们主张上有极大的关键，故决计前去出席”。③大会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密派赵醒侬、邓鹤鸣（共产党员）回赣筹组江西省党部（有的资料上说，国民党中央党部建立之后，派出筹备员筹建各省执行部的江西只有邓鹤鸣）。

赵、邓遵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领导江西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三月间，成立了国民党江西省临时省党部，当选为筹备委员有赵醒侬、邓鹤鸣、涂振农、曾国香（即曾天宇）、邹努、王镇寰、姜伯彰等七人，常务委员会由组织部主任赵醒侬、宣传部主任邓鹤鸣、秘书涂振农组成，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占了绝对优势，临时有党部在南昌设立秘密机关三处，一在解家厂之黎明中学，一在百花州之明星书店，一在应天寺之一平印刷所。临时省党部派出干

部到各地，建立市、县党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成立了十七个市、县党部，党员有二千六百九十八人。这样，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便在江西形成。一九二五年七月，国民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黎明中学召开，选举赵醒侬、朱大贞、邓鹤鸣、张朝燮、方志敏、许鸿、陈灼华等七人为执行委员，涂振农、刘承休、曾振五、付惠忠等四人为后补执行委员，李松风、曾天宇、王镇寰等三人为监察委员，姜伯彰、王立生等二人为候补监察委员，正式成立了省党部，其分工是赵醒侬为组织部长，邓鹤鸣为宣传部长，张朝燮为工人部长，方志敏为工人部长，朱大贞为青年部长，陈灼华为妇女部长，涂振农为秘书。第一届执监委员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占了十二名，这是对共产党人改组江西省国民党组织所建树的功绩的肯定。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赵醒侬、刘承休、陈灼华等三人，代表江西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行至南昌北郊牛行车站时，被军阀方本仁逮捕，经多方营救，始获保释。江西省代表赵、刘、陈三人被方本仁拘留，由邓鹤鸣、涂振农二人补，另有许鸿也是代表。次年三月，仍在黎明中学，召开了国民党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传达了国民党二大的精神，通过了反对奉直军阀的宣言。这一届省党部的领导成员仍同第一届。

江西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国民党省党部及市、县党部取得领导地位，是他们以忘我的革命精神，出色的工作成绩，获得了人民大众的拥护所至。开办明星书社，销售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书刊；创办黎明中学，输送一批青年到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苏联学习，培养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开展“拥护孙中山北上”和“追悼孙中山逝世”的运动，唤起了江西人民对国民革命

的认识和同情；深入农村、工厂、学校，建立各种群众团体，发动和领导了工农运动，青年运动，掀起了声援“五卅”运动的革命高潮这些斗争活动，为北伐军入赣，创造了条件。

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就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并对抗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关于迁都武汉的决定，要把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迁到南昌，以便于他的控制。蒋介石为了实现其蓄谋已久的反革命计划，建立了一个篡夺革命领导权，背叛革命的桥头堡，便指使其党羽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陈果夫，“于九月特派段锡朋、郑异来赣考察党务，办理登记，十一月复加派洪轨来赣会同段、郑办理江西党务”。④段锡朋在广东大学时，“他和右派学生勾结，借此以为媒介，更与陈果夫拉拢，他于是便进了组织部。这就是他得以充当特派员入江西活动的原因”。⑤段锡朋一伙到达南昌后，秉承其主子的旨意，以“序陵同乡”、“北大同学”的关系，网罗党羽，秘密组织了一个专门从事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团体——A B团，其成员主要有：段锡朋、周利生、程天放、洪轨、巫启圣、曾华英（女，人称之为A B团之母）、熊育锡、王礼锡、王冠英、罗时实、贺扬灵、贺其霖、姜伯彰、王镇寰、甘家馨、黄北雅、薛秋泉、何人豪、尹敬让、李松峰、戴源清、刘抱一等。段锡朋一伙，自称是“国民党的新派”。⑥他们秘密组织A B团的目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因为“江西省党部的实权操于共产党之手”，⑦即从共产党手中夺权，为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奠定基础。从此，江西人民同国民党新右派之间的矛盾激化，斗争日趋尖锐。

(二)

A B团建立后，段锡朋一伙与蒋介石、陈果夫等经常密谋，积极策划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召开了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是A B团篡夺省党部领导权的一次预谋。在选举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和候补监察委员时，蒋介石玩弄了一个圈选的手腕，即选举双倍数额，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圈定其中的半数为省党部执行和候补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和候补监察委员，称之为选是“民主”，圈是“集权”。蒋介石伙同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青年部长丁维汾等，假借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名义，非法圈定了一批A B团分子为省党部执行和候补执委员、监察和候补监察委员。若是按得票多少计算，刘伯伦、王镇寰、程天放、王礼锡、洪轨、周利生、姜伯彰、熊育锡、孔绍尧等右派，根本不可能当选；方志敏、罗石冰、李松风等，正应当选的。经过蒋介石策划的非法圈定的十七名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有十四名是右派。这样，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被排除于省党部执监委员会之外，省党部成为一个右派省党部。

为了抗议蒋介石非法圈定省党部执监委员罪恶行径，刘一峰、邓鹤鸣、王枕心三人发表声明，宣布退出伪省党部。于是，伪省党部的执监委员成了清一色的右派。

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对A B团篡夺省党部的领导权，极为愤慨，强烈要求国民党中央查办、改组非法的省党部。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呼声，蒋介石竭力压制，一面假惺惺地声称：前方军事正紧，武装同志非常辛苦，因此后方的同志应一致团结起来，不要

吵嘴。应当拥护江西省党部；⑧一面气势汹汹地叫嚷：“反对江西省党部的就是反革命。反革命的就要把他打倒。”⑨我党毫不理会蒋介石的这种卑劣伎俩，北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的名义，通电呈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查办，改组伪省党部。

A B团篡夺了省党部的大权之后，方志敏领导的江西省农民协会就成了他们进攻的目标。A B团利用他们把持的省党部，“今天对省农协一个决议，明天对省农协又要玩一个花样”，“他们委派了两个委员到省农协”，来破坏捣乱。每次省农协开会时，方志敏“总与他们先争后闹，最后就拍桌大骂而散”。⑩一九二七年二月，江西省农民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A B团又企图玩弄故伎重演，用夺取省党部领导权的手法，圈定省农协委员。方志敏洞察了他们的阴谋。电问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如何对待。毛泽东复电说：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不屈服于圈定办法。⑪“他们圈定不成，就用金钱收买选票，结果露出马脚，大闹笑话！大会选举他们算是失败了，省农协没有被他们夺取去！”⑫

伪省党部妇女部部长A B团分子曾华英，玩弄花招，妄图独揽江西妇女运动的领导权。她强令南昌妇女解放协会执行委员会通电省政府请求解散赣州总工会，拿办陈赞贤，为他们枪杀陈赞贤制造反革命舆论。这一反动提案，遭到了执委会的一致拒绝。此计不成，她又生一计，企图另组一个南昌妇女解放协会干事会，由于所有干事、执委的竭力反对，阴谋又未能得成。

A B团控制的省党部，还派出一批所谓“特派员”，分赴各市、县，进行篡夺市、县党部和群众团体领导权的反革命活动。三月六日，A B团分子贺某伙同新编第一师倪弼、郭巩，在蒋介石的指

使下，与当地土豪刘甲第相勾结，杀害了赣州市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惨案发生后，全国震动，各地纷纷集会或发表文章，追悼陈赞贤同志，声讨蒋介石的罪行。赣州人民更是不畏强暴，举行公祭活动和追悼大会。陈赞贤牺牲后，赣州总工会委员长由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原副委员长钟友千担任，副委员长则由共产党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肖勉允任。因此，A B团在赣州的阴谋未能全部得逞。

伪省党部派往县的特派员，到处制造事端，挑起冲突。三月四日，特派员王道（永新人，黄埔三期毕业），以解决丰城农民协会纠纷为名，“令武装兵士开枪轰击，当场伤工友三名，农友一名，学生三名”。③三月六日，特派员丁国屏（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宜黄县人），在抚州纠众捣乱县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④在永丰县，特派员罗郁芬，于三月七日突然威迫县农民协会筹备处解散，并将农协常委张国俊等赤体捆吊。⑤伪省党部派往于都县的特派员段绍濂，与土豪劣绅相勾结，收买地痞，手持凶器，要捉捕县党部农工学各界执行委员。⑥三月十七日，即蒋介石从南昌到达九江的第二天，伪省党部派往九江党部的筹备员，收买暴徒捣毁市党部、国民新闻社、总工会，打死工人纠察队长曹炳文，重伤市党部职员多人。

三月十四日，段锡朋、周利生以省党部的名义，宣布解散南昌市党部，并于十六日派出七个A B团分子为“接收委员”，用武力解散了市党部。同时，还查办学生会，通缉学生会干部，逮捕工人纠察队员，封闭国民党左派人士李幼农主办的进步报纸《贯彻日报》。

(三)

对段锡朋一伙的猖狂进攻，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三月十七日，江西省各界代表赴武汉，向国民党武汉政府报告江西的情况。十八日，中共江西省委召开南昌群众大会，纪念“三一八”烈士并追悼陈赞贤烈士。会上，群情激愤，一致谴责国民党右派的暴行。大会宣布国民党南昌市党部正式恢复办公。

《贯彻日报》启封出版。伪省党部控制的南昌《民国日报》，是新右派进行反动宣传的阵地。在党的领导下，《民国日报》社工人举行总罢工，拒绝出版。铅印工会和石印工会都贴出不印反革命宣传品的布告，并派人到各报馆各印刷所检查，卡死了新右派进行反动宣传的咽喉。段锡朋一伙，用尽种种利诱威胁手段，强迫《民国日报》社工人复工。然而，工人们不畏强暴，罢工斗争一直坚持到右派省党部“寿终正寝”为止。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至十七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经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彭泽民等共同努力，大会通过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谴责蒋介石军事独裁等各项决议，给蒋介石为头目的新右派的阴谋活动以相当的限制。十九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根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取消违法选举之各省市党部选举，另行改选的决议案，作出了处理江西问题的八项办法，决定“停止江西省党部职权”，“严拿反革命凶手与反革命暴徒”，“开除段锡朋、周利生二人党籍，并由政府通令拿办”。二十三日，国民党中央严令江西省党部“停止职权”，“听候查办”。接着中央党部任命方志敏、李尚庸、邓鹤鸣、王枕心、李松风、刘一峰、付惠忠、黄寒

等为中央特派员，代理江西省党部职权，改组省党部。改组省党部的电报传到南昌，段锡朋一伙贼喊捉贼，诬蔑改组省党部的电文是“叛徒私造的”。四月一日，江西省政府改组的消息又传到南昌。这些喜讯，是对江西人民反对国民党右派斗争的有力支持和鼓舞，顿时，群情沸腾。二日，中共江西省委组织了一次打击A B团的重要行动，由曾经参加过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的袁玉冰任总指挥，朱德领导的市公安局和军官教育团~~组织~~部分人员暗中护卫，浩浩荡荡的工人、农民、学生、市伍队伍，云集百花洲，包围了伪省党部。A B团头目段锡朋、周利生闻讯从后门乘小船过东湖潜逃南京，愤怒的群众占领了省党部，解除了伪省党部纠察队的武装，准备迎接中央特派员方志敏等人从武汉来接管。后来，在袁玉冰的指挥下，分路前往搜查A B团分子，当天捉到了程天放、巫启圣、曾华英、罗时实等三十余名反革命分子，关押在省总工会。三日，两百多个团体，三万多群众，在皇母殿侧公开体育场举行欢迎朱培德改组省政府暨中央特派员改组省党部大会。①这次大会实际上是庆祝反击A B团斗争胜利的大会，是向反动派示威的大会。在大会上，工人纠察队员将A B团分子程天放等捆押上大会主席台示众，群众气愤地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等口号，要求当场枪决反革命分子。大会上各界代表一个接一个地发表演说，痛斥蒋介石杀农工的罪恶，痛骂A B团分子是蒋介石的爪牙。大会决定，由各界民众团体组织裁判委员会处置反革命分子。这次斗争，当时称之为“四、二”暴动。“四、二”斗争的胜利，摧毁了新右派控制的省党部，给予了A B团以致命的打击。事后，程天放也不得不哀叹：“迨四二事件发生，省党部被摧毁，而A B团亦解体，寿命仅三个月。”②

五日，中央党部特派员方志敏等抵达南昌，开始正式办公，行使省党部职权。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九日，在方志敏等积极筹备下，重新举行了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方志敏、刘一峰、邓鹤鸣、李小青、王枕心、朱克、李松风、李桂生、罗石冰、黄道、姜济寰、黄实、王均等十三人为执行委员，付惠忠、饶思诚、朱由铿、张汉梁、严廷生等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肖炳章、涂振农、李尚庸、蒋睦修、邵式平等五人为监察委员，俞漠、曾振五、周继晖等三人为候补监察委员。县、市党部多为共产党所掌握。革命左派又掌握了省党部的大权。袁玉冰热情地歌颂了“四、二”斗争的胜利，是革命民众用革命手段来答复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的壮举，是江西革命史上光荣的一页。与此同时，他提醒革命派，要提防现在的政府和党部发生新的反革命派。²¹

江西反击国民党新右派斗争的局部的胜利，并没有能够挽救整个革命斗争所面临的危机，反动派亦未因此而罢休。正如袁玉冰在当时所指出：“表面上虽然已经是一个很左的革命的政治局面，但是实际上仍旧是蒋介石的余毒未除，充满着黑暗的反动势力”。²²事实正是这样，四月十七日，在九江，“六军学生营队长王学林率官生夺纠察队转杀工人，并禁呼倒蒋口号”。²³朱培德上任后，随即与蒋介石秘密勾结，作叛变革命的准备，据程天放供认：“四、二”斗争的消息传到上海，“蒋介石立即致电朱培德，劝他不可自毁历史。”并责成他保护在“四、二”斗争中被江西人民逮捕的A B团分子。²⁴朱培德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后，如获至宝。“四、二”斗争中被捕的A B团分子，一开始被押送到第三军所掌握的南昌卫戍司令部，朱培德不肯接收，但当他接到密令后，一反常态，将

A B团分子移押南昌卫戍司令部，把这一批忠实的反革命分子保护起来了。五月中旬，朱培德将程天放等人转送由他控制的法院，法院立即宣布程天放等“无犯罪事实”。²⁵“马日事变”后，朱培德的反革命面目暴露无遗。五月二十九日，他将在第三军中工作的政工人员一百四十二名遣送出江西境内，南昌市街头贴出了“欢送共产党出境”、“共产党员如果不出境，就要不客气的对付”，“制止工农运动过火”等反动标语。广大群众已经听到朱培德磨刀霍霍的声音了。六月五日，朱培德下令停止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的活动，并派军队包围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缴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枪械；强令“礼送”袁玉冰、方志敏等二十四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出境；程天放等反革命分子从“法院看守所释出”。²⁶袁玉冰离开南昌赴九江开展革命工作；方志敏乘小轮赴吉安、吉水、莲花、安福四县工作；部分“系五号晚间离南昌”赴武汉。六月八日林伯渠接见了这一部分同志。²⁷

朱培德按蒋介石的旨意在江西驱赶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蒋介石则在南京布置全国规模的剿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群众的计划。五月，蒋介石建立了消灭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清党委员会”和各省、市、区的清党委员会。由他亲手秘密组建的反革命组织A B团的骨干分子，就成为他公开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重要力量。“中央清党委员会”七名成员中有段锡朋、郑异两名A B团分子；“江西清党委员会”十五名成员中A B团分子有周利生、程天放、王礼锡、杨耀唐、洪轨、甘家馨、贺其泰等七人；并以A B团分子段锡朋、洪轨为核心，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江西各级党部驻宁联合办事处”，此反革命组织制定了剿灭江西各地共产党员的血

腥计划，于五月八日呈蒋介石批准实施。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南京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与江西的反动派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一致反共反人民的恐怖局面。至此，江西人民在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所取得的革命成果，被国民党反动派夺去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被迫转入地下斗争。但是，江西共产党人和人民，并没有吓倒，仍然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四)

大革命时期江西人民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曲折复杂的斗争的发生，决不是偶然事件，是有着深刻原因的。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传播，不但遭到了军阀官僚政党的阻挠破坏，而且遇到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反对。在《新江西》杂志上开展的主义问题与政治问题的争论，就是全国范围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大论战在江西的表现，是全国大论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论战充分说明，在江西有些人是十分厌恶马克思主义的。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袁玉冰同后来成为AB团分子的巫启圣等人之间的分歧，袁玉冰在《“内婚与恋爱”发表以后》一文中就有记载。²⁸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左、中、右三派势力，江西的统一战线中，也毫无例外，西山会议派分子就有李烈钧（北伐军占领江西后任省政府主席）、周雍能（任省财政厅长）、徐元诰（省司法厅长）等人。在北伐军入赣前，由于右派人数较少，还未形成核心，其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不甚猖獗。北伐军入赣后，蒋介石为了经营反革命的桥头堡，将一批党羽派回江西，

与已在省内的右派汇合，组成了秘密的反共反人民的团体A B团，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反革命活动。从此，江西人民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日益尖锐激化。

在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势不可避免时，由于我党中央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领导，不是因势利导，造成了不利于我党和江西人民的被动局面，被蒋介石的党羽篡夺了省党部和省政府的大权和丧失了部分县市的领导权。一九二六年，袁玉冰从上海回江西工作后，根据江西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曾向党中央报告，提出了一些切合江西实际的正确主张。袁玉冰建议：江西省政府中有我们同志四人。“共委员资格是以各军军长及政治部主任资格取得；兼之现时江西政府组织还在混乱时代，稍一退让，右派即乘机而入”，我们的“意见是暂不退出，观望形势，以后再决定态度”。²⁹中央回信不同意袁玉冰的意见，虽然表示“一时不退出是可以的；但必须明白的表示：①政治部工作繁重，决不能兼作政府委员；②暂时虽因体制不能退出，以后必需换人”。是不是换上不在军队工作的共产党员充任呢？不是。中央认为必须“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江西共产党员就存在着作官热，是“腐败堕落，充分表现机会主义的倾向。如王环心、涂振农以该县支部书记而去任县长，师古隆之任九江县长且为九江地委所决定；负民校工作者均想跑到政府机关去活动。比较好的愿意做群众工作的人，亦是专门想利用政治势力去发展工作。他们幻想北伐军的胜利与国民党的关得（原文如此）太高，仿佛政府是人民的了，人民自由了，更忘记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在野党，绝不能就跑在政府中去占位置。试问我们得到了这一小部分的政权，能占第二、三个县长位置，可以实现我

们党的政策吗？谁也知道这是绝对不能的。这只有我们在群众中失去说话的地位，失去群众的信仰。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蠢事呢？！不从教育宣传去组织群众，而只图利用政治势力发展工作，则这个工作也是没有基础的，经不得斗争的，不会为我们所有的”。陈独秀按照既定的“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错误原则，严令江西党组织“对于以上严重的错误倾向必须急速纠正，这几个当县知事的同志，当立刻限期命令他辞职。如果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还有不服从党的命令而自由猎官、猎高位的人，亦须严重警告，不听即断然公开开除”。⁸⁰

中央不仅不允许共产党员在省和各级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而且还不准许在省、市、县各级国民党党部中占有优势。中央认为：“过去我们江西的同志拼命占据K、M、T的位置（省党部九人我们竟占了八人），并不想占着这些位置能否做点工作。能否就可抵制别人的进攻。最近工作的经验江西同志应该明白了，工作做不起走（原文如此），且无力抵制别人的进攻。一方面K、M、T工作不能发展，是K、M、T的损失；一方面尽倾我党的全力去从事了、M、T工作，既不讨好，又失了自己”。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兢兢业业地工作，使自辛亥革命后的一个沉默的局面进入到革命运动兴起的局面，对此，中央却得出“然而江西的省党部，在当权者的眼中看去，既无群众，又是一群小孩子在闹，怎能政治上有地位呢？”因此，中央断然指示：“这个局面是再不能敷衍了。我们现在应采取的政策是：1.放出改选空气，迅速办完登记，预备改选。2.极力包围右派中好的分子如王恒、许苏中等，拉在我们方面来，勿便为右派去做工具。3.下届的选举绝对不让一个右

派加入（王、许在江西不能算是右派。只要我们的包围工作做得好），尤其是不要让段锡朋加入（且须遇事打击他），尽量选左派分子进去。我们至多只占农民、青年、宣传三部，如果没有这许多左派分子，当找有社会地位的正派老先生加入，虽然他老成无用，但占住位置抵制右派加入也是很好的”（31）不久，于十二月下旬举行的中央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又一次指责“江西同志尤其是任国民党工作的同志，常表现猎取官职的倾向，江西党部应严厉的纠正之”。（32）

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共产党员退出江西政府和国民党党部的投降政策，正好中了蒋介石篡夺江西政府和党部权力的圈套，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一九二七年元月召开了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员和左派被排斥出省党部；A B团分子掌握了省党部的领导权之后，紧接着改组省政府，李烈钧任省政府主席，姜伯彰（A B团分子）任民政厅长，周雍能（西山会议派）任财政厅长，程天放（A B团分子）任教育厅长，熊育锡（A B团分子）任建设厅长徐元浩（西山会议派）任司法厅长。A B团分子段锡朋、洪轨、王镇寰等为省政府委员。这样，全省的党政大权，就被控制在国民党右派分子手中，共产党和人民的大权旁落。蒋介石利用手中攫取的权力，在江西各地制造事端，流血和不流血的冲突四起，使江西革命运动遇到了新的重大障碍。

面对蒋介石的猖狂进攻，江西一批优秀共产党员袁玉冰、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在毛泽东、林伯渠等指导下，在国民党左派领导人的支持下，不畏强暴，抵制陈独秀投降主义，领导人民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夺回了被国民党右派篡夺的一部分权力，取得了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虽然袁玉冰等提出了一些切中要害的意见，如“我们江西应该迅速武装起来，用我们民众自己的武力去消灭一切反动势力”等正确主张，但由于我党处于幼年时期，加之陈独秀的错误领导，终于未曾实现。当与蒋介石串通一气，拥有武装力量的朱培德叛变时，我党没有招架之功，轰轰烈烈的江西人民革命斗争失败了。

(五)

我们研究大革命时期江西人民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还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对A B团的存在问题再提供以下事实作为佐证。

第一，从A B团的重要头目及其成员的供词中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程天放供认不讳说：“当民国十六年一月，国民革命已进展至南昌时，江西国民党人段锡朋、巫启圣、洪轨及天放等，为团结国民党员，抵制中共分子之把持党务，秘密组织A B团”。⁶³洪轨也说：“国民党员中有深感共党跨党分子篡党阴谋日益严重，乃欲以组织力量对抗之。至于暂将省级称A团、县市级称B团之议，乃贺扬灵所提出。”⁶⁴还有，曾是A B团成员的李松峰于解放初说过：“我和段锡朋、周利生都是国民党的新派，A是代表我们新派的核心组织，B是代表我们的外围组织”。⁶⁵这样，李松峰事实上承认了他们这一批国民党的新派，即新右派，是有一个组织的，而这个组织的代号叫A B。可见，A B这个反共组织的的确确是有的。

第二，从历史材料来看，同样可以得出上述结论。一九二七年三月，汉口《民国日报》在一篇揭露段锡朋的反革命行为的文章中